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3176(2012)02-103-(9)

国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述评*

马雪松

(吉林大学,长春 130012)

摘 要: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导范式,不仅推动了政治科学研究内容的更新,还进一步拓展了政治科学的研究领域,为制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本文主要从制度研究的适用领域与政治学本位视角、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在争论的焦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权力基础、新制度主义视阈下政治制度研究的整合与超越四个方面,对国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现状与理论发展进行综合性的评述。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政治科学;制度理论;政治制度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制度概念和制度研究是各学科进行现实考察与理论探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于西方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各流派在不断发展的历程中,不仅为制度研究空间的进一步扩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石,而且围绕制度概念内涵的界定、制度分析视角的选择、制度研究路径的确立及制度作用机制的功能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本文通过检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重要研究文献和学术观点,主要从制度研究的适用领域与政治学本位视角、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在争论的焦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权力基础、新制度主义视阈下政治制度研究的整合与超越四个方面,试图对来源多样、构成复杂、内容丰富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流派作出综合性的述评。

一、制度研究的适用领域与政治学本位视角

制度概念广泛地存在于法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之中。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三个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科学不仅对制度有着持久的研究旨趣,而且通过深刻的探索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政府治理研究”(10ZD&040)与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项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建构研究”(2011QY032)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1-10-23

作者简介:马雪松 男(1982—)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后

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下图将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中的制度研究路径予以揭示,有助于对其更为直观地认识和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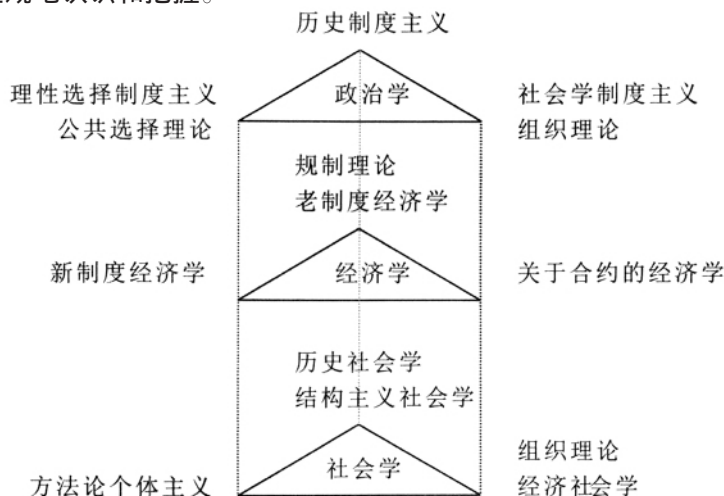


图 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制度研究路径

资料来源:Klaus Nielsen,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 Typology, Dialogue, and Future Challenge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35, no. 2 (2001), p.508.

就经济学而言,制度分析深深植根于经济研究的传统之中,研究者往往将经济学的制度学派划分为老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观点,德国历史学派(German historical school)构成了经济学老制度学派的主要思想渊源,主张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在于考察经济领域中人们的感情、思想、意图,通过深入了解经济制度的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化背景,揭示现存制度在时间中的演化。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本能主义、进化主义和整体主义等分析方法与理论主张,提出有关制度的系统性经济理论。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学中的新、老制度学派的联系是微乎其微的,这突出地体现在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与方法。科斯对企业性质及交易成本的考察,以及诺斯对产权进行的经济分析,推动了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这也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就社会学而言,社会制度及其他制度性结构是奠定该学科研究的基础性范畴。社会学者吉登斯指出,社会学“涉及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其特别强调对现代工业主义诞生以来的那些社会形式的研究”。社会学者Steve Bruce也认为社会学是有关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研究。社会学者库利批判了社会研究中的孤立论,提出将社会看作由形式或过程构成的复杂性有机体,而制度在社会过程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这表明社会学已经明确意识到方法论个体主义同整体主义研究路径的不同,而研究者对社会现象与制度性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则会影响制度理论的建构方式。社会学家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人不仅奠定了社会学重视制度研究的传统,而且为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研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就政治学而言,B. Guy Peters、Sven Steinmo与Kathleen Thelen均强调政治科学同制度研究的密切关联。Peters对政治科学中的制度主义作出“新”、“旧”之分,并被政治学研究者广泛采纳。在Peters看来,“新制度主义”不仅暗示着存在一个旧制度主义,也暗示新制度主义区别于旧制度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成为政治科学的主导范式之前,旧制度主义一直都是政治科学研究的主要特征。行为主义尽管结束了旧制度主义的主导地位,但行为主义在理论分析和现实解释方面却存在严重的不足,这突出地表现为它“无法对重大且具决定性的背景因素进行概念化”。

基于对行为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旧制度主义研究传统的某种继承,在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中产生了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路径。不同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是,历史制度主义产生于政治科学的“本土”之中,政治科学研究构成了历史制度主义的主要来源和背景。一方面,Peter A. Hall与Rosemary C. R. Taylor认为,20世纪60、70年代在比较政治学中盛行的政治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对历史制度主义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以蒂利等为代表的比较历史分析理论学者,以及政治科学中的“国家复归”学派也为历史制度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助推力。

总体而言,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中产生、发展并演变的各种制度研究取向,不仅深植于各自学科的概念体系和理论脉络,而且每一个学科内部也都有新、旧不同的制度研究分野。尤其复杂的是,产生于经济学研究传统中的新制度经济学也不同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模式,后者则同历史制度主义一道被视为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流派。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演化为政治科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而这也代表了以政治科学为本位的制度研究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事实上,对新制度主义各流派的综合性概述乃至引介,一直都是政治学者所关切的。此外,政治科学领域之内的制度研究者也以开放和积极的态度,看待自身以外其他学科的制度研究。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的主导研究路径始终跨越各自学科的界限,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集聚在自身路径之下,政治学者始终共享着社会学和经济学这类兄弟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制度研究在社会科学之中不仅跨越了既有学科的界限,而且在领域交叠和方法融合上不断向前推进。其一,新制度经济学对产权、交易成本等核心概念的宏观性及历史性考察,使其理论视野延伸至新古典经济学较少涉足的政治领域。其二,政治科学的制度研究者也将研究视野投向社会学领域。历史制度主义者Theda Skocpol通过考察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国家结构、国际因素、阶级关系,并结合各国内部的社会现实与发展程度,指出了社会革命的起源与后果之所以存在差异的原因。与之相应,社会学研究者尤其是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者也对正式组织和现代政体形式展开深入的研究。其三,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制度分析方面同样存在着研究领域的重合。很多新制度经济学者对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知识产生兴趣,并关注社会嵌入性和社会化过程的经济意义。^①尽管如此,对政治学研究者来说,如何立足于固有学科领域之内,并根据社会科学内部的理论和方法发展情况,在政治研究的问题领域及对象集发生变动的形势下保持研究立场与学科本位,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和重要意义的课题。

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在争论的焦点

美国政治学者James G. March与Johan P. Olson于1984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中指出,政治生活的组织因素在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并宣称政治科学开始出现不同于以往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②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分析路径,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制度在决定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如此,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在很多方面存在争论,这尤其体现在自称为新制度主义的研究途径至少有三个之多。新制度主义研究者William Roberts Clark根据社会科学中能动的和结构的关联性,以及不同研究者的“本体性原初关注”,将新制度主义划分为两个分支,即“围绕能动的制度主义”和“基于结构的制度主义”。^③Peters则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具体划分为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实证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等七个流派。在新制度主义的各种划分方式中,Hall与Taylor提出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三分法被研究者广泛接受,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流派划分方式。^④下表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个流派的主要特征予以概括。

表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个流派的主要特征

	社会学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对世界的认识	整体主义、建构主义、集团认同； 分享过去或共同的经验	经过修正的利己主义；由共同协 定约束或架构的能动性	方法论个体主义；利益最大 化的策略者
典型性研究设计	文化与认知的案例研究	历史社会学的案例研究	对假设的因果性说明；宏观 定量检验
时间阈	长期	长期	短期
对制度的界定	规范、规则、文化	正式及非正式的规则	规则、程序
制度的角色	主要的自变量；文化性约束	干预性变量；密布性约束和机会	干预性变量；情境性约束和 机会
偏好的形成方式	内生性过程	内生性过程	外衍性理论解释
制度的创设	演化式的；新事件或重新解释导 致的偶然性突发变迁	委托式的；自我维持并潜在扩展	由冲突的分布、交易成本的 降低及集体行动困境驱动
制度的演化	对于共享事件进行神话编造的 认知及记忆过程	伴有路径依赖和非预期后果的 意外性过程	交易过程和演化选择

资料来源：Mark D. Aspinwall and Gerald Schneider, Same Menu, Separate Tables: The Institutional Turn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38 (2000), p. 7.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各个流派中,存在着持久且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是它们相对独立地产生于差异明显的研究背景乃至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甚至就政治科学研究者所指称的社会学制度主义而言,很多研究者也往往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对其进行理解的。例如,Peters以及Hall与Taylor所理解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实际上就同某些社会学者理解的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或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大相径庭。^⑤就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而言,理性选择研究本身包含大量侧重不同思想的学派,它们构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多样性的基础。^⑥就历史制度主义而言,尽管政治学者对这一流派的内部构成并没有存在较大分歧,但比较政治学者及比较政治经济学者在历史制度主义的政策研究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除了基于不同学科领域和分析角度所导致的流派划分上的争论之外,侧重不同研究路径的三个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在制度分析的核心问题上也存在竞争性的理论主张。

首先,新制度主义各流派对制度内涵的理解是不同的。Kenneth A. Shepsle指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制度概念有两种界定方式,其一是外衍性约束(exogenous constraints)即既定的外衍性博弈形式(game form),第二种方式则是类似于博弈方式的选择机制。^⑦社会学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理解较为宽泛,在规范意义及认知层面上界定的制度往往同组织和文化不加以区分。例如,社会学制度主义所界定的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还包括符号系统、认知脚本和道德模板等。^⑧而在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概念的理解中,制度同组织及组织所制定的规则或约定是紧密相关的。由此可见,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流派对制度的界定,不仅涉及静态的一般规则或动态的规则制定过程,还涵盖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和习俗,甚至包括同文化或组织密切相关的要素。

其次,新制度主义各流派的理论特征和研究路径也有较大的差异。根据Hall与Taylor的概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突出特征是采取理性人假设,倾向于将政治视为集体行动的困境,可以产生决定性政治后果的策略性行为,以及使用演绎分析的方式假定行动者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创设制度。^⑨Thelen与Steinmo认为,历史制度主义具有几项一般性特征,分别是重视居间性制度(intermediate institutions)对政治策略的塑造,认为制度可以构造社会之中相互竞争的集团的权力关系,并关注既定制度性限制因素之下的政治活动和政策制定过程。^⑩就社会学制度主义而言,倪志伟(Victor Nee)

指出它的分析核心是“受到约束的选择”(choice within constraints)概念,即把制度界定为对社会关系予以规约的交互性规则或规范的网络。^②

再次,新制度主义各流派在偏好形成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争议。偏好作为现代经济学对于个体行动者“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理性选择理论分享。例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理解的经济人是一个目标明确、行动果决并使其私人价值最大化的能动者,政治活动被看作个体偏好通过讨价还价、协商、联盟及交易等过程所汇聚成的集体行动,因而个体行动者均具有先在的欲求和偏好,以此来决定他们合意的目标并实现预期的结果。^③然而,一些新制度主义者指出,政治行动的“利益和偏好产生于行动的制度性背景之下”。^④因此,以Shepsle为代表的部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认为某些偏好也可能是内生于组织之中的,重视结构与程序等制度性因素对个体偏好的影响。^⑤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更是明确指出,不存在抽象的理性行动者,人们的偏好并非被简单地给定,合理性(rationality)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由社会和历史建构的。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解,制度性背景不仅影响行动者的策略,也塑造着行动的目标,如果缺乏对背景因素的认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自利行为假设则完全是空泛的。^⑥

最后,新制度主义各流派在更深层次的社会本体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化约论(reductionalism)认为政治现象应被理解为个体或集团行为的聚集,其偏好和权力都是外衍于政治系统的,并取决于他们在社会和经济系统中占据的地位。效用论(reductionalism)则认为,政治事件应被描绘为基于算计所做决策的结果,人类生活或政治生活的特质就是审慎的决策制定。^⑦同这种对人类行为、政治生活及社会构成的观点形成对立的是,很多研究者反对静止不变的和普遍一致的人性观,认为政治行动者具有灵活性,易受影响且富于变化,并由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所塑造。一般而言,以上两种理解人类行为的方式,以及将制度要素同人类行为予以结合的认识方法,分别对应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后果逻辑”与“适宜逻辑”。^⑧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者提出算计途径与文化途径作为两种具有社会本体性意义的制度分析方式,分别构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历史制度主义实际上并不单独具有另外两个新制度主义流派分别占据的社会本体性。^⑨

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权力基础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和发展,始终伴随着制度研究者对于权力现象及权力关系的持久关注和深刻考察。尽管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主要流派产生于不同的研究背景和理论传统之中,但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均重视权力问题,并从一定角度在制度分析或理论建构中揭示制度现象所蕴含的权力关系。这意味着,当我们以政治学作为研究本位来考察新制度主义的丰富内涵和复杂脉络时,一方面,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学术成果为政治权力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资料和理论素材,另一方面,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也为系统探究权力与制度的关联性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其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同与之密切相关的公共选择理论共享相似的理论渊源和研究方法,而且在研究主题及对象的选取上,都对传统政治研究的权力分析形成了有益的补充。举例而言,理性选择理论者Keith Krehbiel分析了美国国会委员会成员的权力关系对法案获得通过的影响。Itai Sened论证了制度产生于理性个体将其意愿(will)施加给其他个体的愿望(desire)。对这些具有能动性的个体而言,他们为了创设制度必须拥有操控政治结构的能力,而新制度的确立与制度缺失相比,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⑩Barry R. Weingast在阐释制度的影响时,强调并不存在唯一的议程形成模式,并认为具有优势地位者对议程的设置掌握垄断性权力。^⑪政治学者Jack Knight在其代表作《制度与社会冲突》中指出,对于制度的解释应该基于冲突性因素的分布(distributional conflicts)

和权力的视角,而不是立足于集体收益(collective benefits)的分析,这种观点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③值得强调的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Terry M. Moe自觉地对这一流派的研究基础和理论主旨进行了深入反思,指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权力的研究有着基础性的作用,而权力分析对克服现有研究困境并促进理论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影响。在Moe看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理论发展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它倾向于将政治制度视为自愿合作的结构(structures of voluntary cooperation),认为该结构可以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并使所有相关者获益。然而,在现实政治过程中,制度总是令某些人的收益变得更好而使其他人的处境变得更差,这取决于人们之中谁掌握权力以贯彻其意愿。基于这样的认识,Moe强调可以把制度理解为一套合作结构,但同时不应忽视制度也是某种权力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丰富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权力的认识,拓展了权力研究的理论深度。

其二,历史制度主义直接继承了政治学乃至社会学重视权力的研究传统。历史制度主义不仅指出制度性权力(power of institutions)的重要作用,而且强调政治行动者及政治组织在运用理性时的局限性,从而揭示人们的意图在权力斗争中不断受到制度的影响。Hall与Taylor在概述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特征时指出,它强调权力以及权力关系的非对称性,并进一步指出所有制度研究都同权力有着直接的关联。^④德国政治学者Ellen M. Immergut通过对法国、瑞士和瑞典三国医疗政策的考察,指出制度的起源在历时性上独立于行动者及其策略,因此制度是被那些围绕着政治权力展开斗争的行动者创立的。^⑤在政策研究的具体层面上,Hall在英国和法国政府干预经济方式的比较研究中指出,制度因素的作用体现在组织的层级机构通过为职位赋予某种制度性的责任和关系(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nd relationships),从而影响行动者对自己利益的界定。^⑥Steinmo在对美国、英国、瑞典三国的税收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时指出,制度不仅改变了决策过程中参与者的权力分布,而且决策活动的制度结构也深深影响了利益集团、政客和官僚自身政策偏好的形成。^⑦

其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研究也十分重视权力分析的重要意义。由March与Olsen开创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范式,在某种意义上根源于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观念。“制度为某些行为的规则赋予了正当性,这一点同效用最大化的观点相比,更关注权力关系及社会性和文化性规范”。^⑧此外,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对制度性同形(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所作的考察,也蕴含着丰富的权力分析。因此,社会学者Andrew Abbott认为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尝试把权力带回新制度主义之中”。^⑨具体而言,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象征、符号和认知的作用,尤其重视文化对社会、组织的塑造,因此主张人们通过争取必要的文化资源将文化要素转化为某种权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核心问题包括探究什么因素赋予某些制度安排以“正当性”或“社会适宜性”,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关于文化权威(cultural authority)来源的问题。^⑩与这样的认识相联系,历史学者James T. Kloppenberg指出,“制度的登台与退场既涉及新的观念和新的权力结构(new configuration of power)”。这意味着人类行动总是试图满足自身预期,而预期又存在于具体的背景之下,并且植根于文化背景、社会结构及政治场域中。^⑪

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整合与超越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认为,制度理论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的基本问题和核心领域,它所关注并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有:“应该如何解释人们的行动?制度、组织和效用计算(calculation of utility)在决策当中具有什么作用?应该如何权衡个体、决策得以制定的制度性背景?怎样看待文化、社会规范和习俗这些广泛的因素?”^⑫可以说,这种认识制度理论的方式,蕴含着将制度研究中的分歧予以统合的某种尝试,“如果认真对待制度理论的话,那么就不应该以多样化的方式来考虑世界”。^⑬

B. Guy Peters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流派融汇和综合的可能性做出了深入分析,指出在对政治科学的不同制度研究路径予以清晰界定的同时,还要考虑各种分歧能否被汇聚起来。首先,所有新制度主义研究路径都强调共同的理论基点,即认为以制度作为分析基础会比基于个体的分析获得更多的理论成果。其次,所有新制度主义流派都重视结构性要素在决定个体行为及政治后果方面的重要角色。第三,几乎所有新制度主义流派都把制度视为人类实践的结果,而且认识到“制度由人类能动性塑造但同时约束行动者”这一悖论。在这个意义上,Peters认为在政治科学的各种制度研究路径之中,存在着构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制度理论的内核,而这种“新制度主义”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当代政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尽管如此,Peters也指出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进行的综合工作还有待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突破。一方面,新制度主义应克服现有理论局限,对制度本身作出更多的解释。另一方面,不同制度研究路径的融汇和综合也要求新制度主义成为一个可以被证伪(falsifiable)的理论。对于制度研究者来说,尽管无法为制度性行为(institutional behavior)提供完整的解释,但仍有希望获得一种更具理论复杂性和内在一致性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②

Hall与Taylor在承认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个主要流派以相互独立的方式产生并发展的同时,指出它们具有相互借鉴和整合的潜在可能性。一方面,新制度主义各流派从其他研究路径汲取理论资源,这有助于发展出一套更为精深复杂的制度理论,从而解决自身研究范式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这种理论交汇得以可能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流派都真实地揭示了人类行为的不同维度,也揭示了制度对行为的影响。由于这样的揭示并非错误或不真实的,因此每个流派都基于不同理论背景对人类行为和制度影响的多重维度提供了部分说明。两位研究者强调各个流派如果放宽理论假设中最极端的部分,它们便会共享大量的理论基础,其他流派的理论洞识也可以补充或强化自身流派的研究内容。此外,Hall与Taylor从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立场出发,强调历史制度主义在综合政治科学中的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方面居于中枢位置(pivotal position)。“该流派近期的研究成果可以很容易地转述为理性选择理论的话语,而其他研究成果则向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敞开大门”。^③

日本政治学者Junko Kato指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尽管存在相互冲突,但部分学者已开始致力于对不同的研究路径进行比较,“最终目的是在那些支持与反对理性假设的研究者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一方面,不同流派都关注制度如何塑造政治行为和政治后果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其研究内容都包括正式的规则和组织,以及非正式的惯例和程序。“尽管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制度起源方面同另两个存在冲突,但理性选择理论近期的发展正在填补两个路径之间的分歧”。^④

Kathleen Thelen指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流派尽管表现出极大的内在差异,但研究者却很难在它们之间遽然作出剖分。此外,各个流派内部也存在很多“越界而动”的研究者(border crossers),他们一方面反对把各流派的边界予以扩大,另一方面注重从其他流派那里吸取有助于更好地解释现实问题的实证工具。具体来看,各流派的相互借鉴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一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以更为兼收并蓄的研究方式将理性选择理论的演绎论证同历史制度主义的情境研究融合起来。其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方式对历史制度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三,历史制度主义同社会学制度主义之间也在深入地相互借鉴。在很大程度上,新制度主义各流派的综合突出体现在历史制度主义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交汇上,即理论研究同实证研究的交汇,偏好形成的外衍性主张同内生性主张的交汇,微观基础同宏观历史的交汇,以及制度观的功能取向同历史取向的交汇。^⑤

尽管很多研究者对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点对话、流派综合乃至理论超越方面具有雄心勃勃的抱负,但一些研究者对此却持谨慎态度。比如,政治学者Morris Fiorina认为,目前在历史制度主义与主流政治科学研究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并非由于研究者在制度研究及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上有不同看法。造成差异的主因是研究者之间的实质性分歧,即“体现在专家同民选官员之

间、偶发事件同能动性之间、观念同利益之间,以及不同的方法论偏好(methodological preferences)之间的分歧”。Fiorina主张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并非一个研究路径或一套理论承诺(a set of commitments),与此相反,对那些出于不同研究传统并具有不同研究旨趣的学者来说,制度应该是不同研究方式的对象。^{④⑥}

综上所述,政治科学内部以及其他学科研究领域中的理论发展,构成了制度回归并最终实现理论复兴的基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不仅为政治科学的制度理论开辟了崭新的领域,也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主要流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却始终表现出各个流派在分析视角和研究旨趣上的严重分歧。因此,这要求政治学研究者们在探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基本范畴和内在逻辑的同时,必须解释不同流派在研究路径、分析角度和关注对象上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

注释:

盛洪《为什么制度重要》,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考德威尔《哈耶克评传》,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6-52页。

黄少安、张卫国《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及其比较》,《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

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页。

Steve Bruce, *Soci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8.

库利《社会过程》,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5-36页。

③ 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03页,第258页。

④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1996), pp. 937-938, p. 956, pp. 937-946, pp. 947-949, p. 940, p. 949, pp. 955-957.

Paul Pierson and Theda Skocpol,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Work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s, Washington D.C., 2000.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①②①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pp. xii, p. 8.

②③②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 (1984), pp. 734-749, p. 744, pp. 735-736.

⑬ William Roberts Clark, Agency and Structure: Two Views of Preferences, Two Views of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42 (1998), pp. 245-270.

⑮⑮④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Pinter, 1999, p. 25, p. 105, pp. 141-151.

⑮④⑥ Morris Fiorina,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y*, vol. 23, no. 1 (1995), p. 110, p. 109.

⑰ R. A. W. Rhodes, et 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4-27.

⑳③③ Sven Steinmo, et al.,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7, p. 85.

②②⑦ Bernard E. Brown, *Comparative Politics: Notes and Readings*. Belmont: Thomson Learning, 2000, p. 307, pp. 307-309.

②④ Kenneth A. Shepsle, Studying Institutions: Some Lessons from 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 no. 2 (1989), pp. 136-138.

②⑤ 马雪松《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在张力与理论取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②⑥ Colin Hay and Daniel Wincott, Structure, Agency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 46 (1998), p. 953.

②⑨ Itai Sened, Contemporary Theory of Institutions i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3 (1991), pp. 379-402.

③① Jack Knight,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9.

③④ Peter A. Hall, *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the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31-232.

- ③⑤ Sven Steinmo, *Taxation and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
- ③⑥④⑩ Thomas A. Koelbl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8, no. 1 (1995), p. 233, pp. 231–232.
- ③⑦④⑪ Andrew Abbott, An Old Institutionalism Rea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21 (1992), p. 754, p. 756.
- ③⑨ James T. Kloppenberg, Institutionalism, Rational Choic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Polity*, vol. 28 (1995), p. 126.
- ④④ Junko Kato, Institutions and Rationality in Politics: Three Varieties of Neo-Institutionalist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6 (1996), pp. 553–582.
- ④⑤ Kathleen Thele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1999), pp. 372–379.

A Review of Foreign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Ma Xuesong

Abstract: New institutionalism 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 was established by several American scholars in the nineteen eighties, then being concerned to a degree by many political researchers as the most popular research paradigm.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not only renews the theoretical content of political studies, but also extends the political science's research fields,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ory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is article surveys the emergence path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examines many theoretical works written by institutionalist researchers, then overviews the theoretical and analytical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studies' own position, of inner debates and power base, and of integration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Key Words: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cience; Institutional Theory; Political Institution

(责任编辑 谭力)